

「走過經國歲月： 陶涵（Jay Taylor）與錢復對談」紀實

廖文碩整理、許瑞浩審訂*

2009年適逢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國史館與蔣經國國際交流學術基金會、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等單位合辦相關紀念活動，邀請《蔣經國傳》作者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與前監察院長錢復先生對談經國先生的事業與人生，4月11日下午3時於誠品信義店六樓視聽室舉行，許多經國先生的故舊、親友，以及政、學界等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均出席了這場難得的盛會。對談會共進行二小時餘，現場反應十分熱烈。對談會由蔣經國國際交流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教授主持，會中錢復先生以中文發言，陶涵先生則以英文發言，由黃馨如小姐口譯摘述，朱教授以中英文分別回應，本文以中文記錄，英文談話則完整翻譯。¹以下

1 陶涵（Jay Taylor），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國事務，曾任職美國駐臺北及北京大使館、國家安全會議，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相關著作包括：《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文版《臺灣現代化的推手——

為座談會紀實：

朱雲漢：各位貴賓、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先生，我代表蔣經國基金會歡迎大家今天下午撥冗參加這場非常特殊的對談會。這場對談會是慶祝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歲誕辰系列活動的一環。我們知道在追思或評價一位重要人物的歷史地位時，有二項重要參考指標：一是這位歷史人物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我們常說：「公道自在人心」，民眾心中自有一把尺，這是任何政治人物或其他力量都無法輕易左右的，這樣的評價極為根本而重要。在過去20年許多研究

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2000年）等。

錢復，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哲學博士。曾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總統蔣中正的英文秘書，國立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兼任教授，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長兼政府發言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代表、行政院政務委員、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外交部長、國民大會議長、監察院長等政治、外交、經濟要職，長期隨侍蔣中正、蔣經國兩位總統，參與國政。相關著作包括：《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錢復回憶錄·卷二：華府路崎嶇》（臺北：天下文化，2005年）等。

朱雲漢，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陶涵與錢復對談會現場，右起：朱雲漢、錢復、陶涵、黃馨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提供，曾秉常攝）

機構所做的民意調查，詢問在政府遷臺後，歷任中華民國總統中哪一位對臺灣做出最大的貢獻，毫無意外的，經國先生均居首位，遠超過排名二、三者，獲得絕大多數民眾的肯定。這樣的民調支持率，在經過5年、10年、20年後猶能保持穩定，是一項很重要的指標。

另外一項同樣重要的指標，就是透過學者，特別是歷史學家的千秋之筆，提出對某位人物的評價，這種評價並非直覺或常識性的判斷，而是經過嚴謹而詳細的考證，以非常宏觀的視野，從歷史的長河、大時代的背景，具體依據此人物的言行與作為來理解他、評價他。隨著時間的逐漸推進，與這位人物生活的時代相距越遠時，歷史學者的筆觸所

遺留下來的紀錄和評價便愈形重要。今天理解中國歷史上許多帝王將相，便要透過如司馬遷等所有以公正、嚴謹的態度撰寫歷史或傳記的人，來理解過去值得我們景仰或效法的先賢先聖，理解他們的作為、功績與事業。我們今天舉辦這場對談會，也是從這樣的角度來切入。

今天十分榮幸邀請到兩位非常重要的貴賓來主談，其實在座有許多前輩、先進，生活過這樣的時代，跟隨過經國先生，也有非常豐富的政治、學術經歷，都有資格做這樣的主談，來現身說法。我們是不是先從這兩位特邀貴賓，由他們的口中、記憶中，來回顧經國先生的事業與人生。從美國邀請來的陶涵

先生，Mr. Jay Taylor，目前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研究員，過去長期在美國外交界服務，是國務院的資深官員，也曾在臺北和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服務過，親身參與了過去幾十年臺海兩岸和中美臺關係的風雲起伏。此外他也是位有扎實訓練的歷史學者、傳記作者，退休後專心致力於兩件一脈相承的工作，其一是完成了《蔣經國傳》，由美國最重要的學術出版機構哈佛大學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當時獲得了很好的評價。我們甚至可以說，將來在五十年、一百年後，很多西方學者、人士，透過英文來

理解經國先生的人生與事業，都必須依賴這本著作。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陶涵先生費了許多工夫往返兩岸及美國各地，使用各大圖書館、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及國務院等的解密檔案，也利用了莫斯科方面的解密檔案（我們都知道經國先生在蘇聯度過了青少年時期）。並做過一百六十餘次的訪問，包括經國先生的故舊、同事、親友，以及相關專家，都提供他許多珍貴的資料。今天在座的錢院長，也對他有所幫助。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的創辦人余紀忠先生



陶涵與《蔣經國傳》中文譯者林添貴（右）合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提供，曾秉常攝）

對陶先生提供了經費資助，但余先生做了個很好的決定，時報公司不會對這本書的內容做任何干預，會一字不易的將文稿翻譯成中文，並在英文版出版之後隨即出中文版。這本書的最新版也剛剛問市，陶涵先生特別寫了一篇新序，也是他經過八年變化後的一些更進一步的思考與回顧。陶涵先生的第二本著作也非常重要，我相信在未來幾年美國的歷史學界引起熱烈討論，那就是《蔣介石傳》，目前已經獲得了許多正面的評價，當然任何涉獵廣泛的書籍（我們都知道老蔣總統跨越的時代更長），都會引起許多的辯論，這也是意料中的事。

另一位主談的貴賓，大家都非常熟悉，錢院長不僅是經國先生生前最器重的部屬，賦予他很多重要的任務，錢院長其實也是位訓練嚴謹的讀書人。他有幾個驚人之處，是我完全望塵莫及的，首先是他的記憶力，能過目不忘，看書速度非常快，大概是我的3、4倍，令我非常羨慕。他經歷過的事情，很多細節都能記得，不久前寫了回憶錄，過程非常嚴謹，我想他花的工夫可能一般人可以寫3本回憶錄了。他的辦公室堆滿了剪報、檔案、個人紀錄，因為他希望對每一事件、每一細節，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的經緯，都能正確掌握。錢

先生不僅與經國先生關係密切，有近身的觀察、互動與學習過程，自己也有非常優良、嚴格的學術訓練，所以今天能請到錢先生與陶涵先生對談，十分難得。

今天對談的進行方式，在此稍作說明：首先請Mr. Jay Taylor講20分鐘，談談他對經國先生的事業與人生的感想與追思。為了節省時間，陶先生將以英文發言，接著錢先生和我則以中文發言。待兩位談過後，我將提出一些問題請教他們，最後保留半小時，歡迎在座各位提出您的想法、問題或意見。接下來有請陶先生。

陶涵：謝謝雲漢的介紹。很久以前的求學時期，我和Fredric Chien（錢復）是很好的朋友，在臺北工作時也是很好的同事。可是這幾年，我的中文變得馬馬虎虎，所以請黃小姐替我翻譯。今天我想談談蔣介石和蔣經國，將他們做一比較，從過去談到未來，並談談二人的思想見解。在美國，若是面對像今天這樣的聽眾，我會問：「有誰不知道蔣介石嗎？請舉手。」事實上去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歐巴馬（Barack Obama）競選總部有人打電話邀我參加活動，我說我正忙著寫書不克參加，對方問我寫什麼書，我回答：「蔣介石

的傳記，你大概不知道他是誰吧！」對方說：「我知道呀，就是那位波蘭導演。」當我說我在寫一本有關蔣經國的書，也有人不曉得那是個人名而問道：「那是個環保議題嗎？」今年是經國先生的百歲誕辰，同時也是幾個很有意思的週年紀念。回到1969年，也就是40年前，對我而言那是臺灣真正民主化的肇端，當時蔣經國決定，為了臺灣的未來、也為了國民黨及兩位蔣總統的聲譽，臺灣必須進行民主化，縱使他瞭解這會帶來很大的風險。同時今年也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20週年，蔣經國已於前一年去世，倘若他還在世，我想他也會感到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因為這不僅中止了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也使「一個中國」的推動遭到挫折，他一向認為要臺灣大多數民眾接受「一個中國」，中國大陸就必須民主化。我稍後會再談到中國大陸的現況，及其與蔣介石和蔣經國的關係。

首先我想簡短談談兩位蔣總統的個性、人格特質，及性情上的差異。蔣介石是個威權人物，具有威權性格，木訥、內斂、重內省、情緒化、脾氣暴躁，在很多方面十分浪漫，包括他喜歡讀詩，在公共場合牽著夫人的手（這點非常不像中國人），採花給夫人，在悲

傷或情緒脆弱的時候，會忍不住啜泣。然而同時也有新儒家的性格，能深刻自省，自我激勵，鞭策自己成為具備堅毅人格與儒家理想道德的領袖。他認為做為一位領袖，不僅要深思熟慮，更要積極地追求與實踐理想。而經國先生在個性上則相當不同，他沒有威權性格，富同理心，樂於助人，開朗外向，不以儒家自居，卻也表現出儒家的性格與價值觀，有意或無意地反映了他的家庭教育，雖然不像他父親每天清晨自我反省，但也極注重道德修養，講求規矩、誠實、正直、勇氣等。

兩位蔣總統各有其對臺灣的見解與發展遠景，以及對於「一個中國」的看法、理念與實踐方式。在蔣經國百歲誕辰之際，思考今日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發展現況，不知道兩位蔣總統的反應會是如何？我想他們可能都會對今日臺灣的繁榮、高度的生活水平與社會的複雜糾結感到訝異。而蔣介石由於威權性格使然，大概會對民主化所帶來政治上的混亂感到不悅吧！但也許當他以臺灣的過往歷史、世界現況與未來展望為前提來思考時，我想他會認為蔣經國是正確的。或許蔣經國也會與他爭辯，為了臺灣的進一步發展，臺灣必須維持生存、對外開放，並發展民主，這不僅是為了

人民的福祉，也是為了國民黨及兩位蔣總統的名譽。1969年開始改革政治體制（在座許多人都還未出生吧），舉行首次中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許多人以黨外名義參選，其中三位著名的反對運動人士：郭國基、黃信介【按：以上參選立法委員】、康寧祥【按：參選臺北市議員】，首度在公開演講中控訴政府。例如郭國基指出，蔣介石一日執政，臺灣便一日無法發展；而黃信介則直陳光復大陸無望，而臺灣人將遭外省人歧視。這些都是前所未聞的。蔣介石當時必然默許蔣經國鬆綁控管，以便安撫臺灣本地人民的需求，並顧及美國政府對臺灣發展的看法。

另一方面，蔣經國應該會對臺灣的現況感到欣慰，並肯定他的所做所為，儘管民主化有其風險，但今日臺灣的發展已遠遠超出了蔣經國的期待，臺灣的民主已通過試煉，經歷二次政權的和平輪替，邁向成熟與穩定。臺灣社會的公平、開放，為中國大陸以及全世界樹立良好典範。儘管20年前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我想蔣經國會認為臺灣的典範已在中國大陸產生影響，只要臺灣民主持續成熟發展，必然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兩岸的差異不可避免，而中國大陸何時能民主化尚不可知，但我想兩蔣都

會對當地經濟的高度發展印象深刻。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共產黨領導階層願意放棄紅色中國、赤色革命、階級鬥爭等信條，取而代之的是以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所提供的倫理道德為依歸，我想蔣介石會對中國大陸回歸儒家文化感到滿意吧！諷刺的是，今日中國大陸貧富差距甚大，貪汙與社會不公情形嚴重，相對之下，臺灣社會平等多了。兩蔣大概相信，若非日本侵略與蘇聯干預，共產革命不會發生，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將提早20年，中國人民的生活將得到更好的保障。

蔣經國本人曾提到，臺灣可以為中國大陸樹立經濟發展與民主發展的典範，事實上蔣介石也曾表示過類似的看法。1967年當蔣介石的老友、美國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H. Judd）訪臺時，蔣介石曾告訴他以下這段必須守密的話：蔣介石自認由於共黨叛亂、派系鬥爭、軍閥割據而失去中國大陸，來到臺灣時，相對而言沒有這些問題，因而得以施行多年的獨裁統治。我想兩位蔣總統都認為，獨裁統治是當時維持社會控管與穩定的必要手段。我想蔣介石會特別覺得胡錦濤在這方面的看法與他如出一轍，就在幾週前胡錦濤曾對公安官員表示，社會穩定勝過一切，社會不穩定

則任何事都做不成。蔣介石大概會以為這是一種儒家思想的表現。而胡錦濤也算具備了這樣的思想，當然蔣介石也許會主張共產黨的社會控制，相較而言是太過分了，而且是不必要的。儘管今日中國大陸已較為開放，但在公民參與上仍比當年的臺灣落後許多，問題依然存在，如蔣經國所言，期待以臺灣的典範來影響中國大陸。事實上兩蔣執政時期的臺灣與現今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條件並不相同，當年兩蔣面臨了來自各方的極大壓力，由於臺灣的戰略地位，而得到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的支持，而現今中國大陸則少了來自這方面的影響力，比較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兩蔣執政時期的臺灣由外省人執政，這使得執政者更加難以釋放權力，全世界大概只在南非有類似的情形，也就是少數族群在長期掌權後，才將政權歸還給多數族群。這種現象在現今的中國大陸並不存在。我想蔣介石對於民主化始終感到懷疑，而蔣經國則保持樂觀，認為民主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還可以談談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所發生和發現的幾件事情，其中一個核心話題是，蔣介石是個十分成功的外交家，與俄國、日本、共產中國、美國等周旋，處境異常艱難，但他的成就在西方

世界卻為人所忽略。蔣介石強調儒家的道德修養，然而為了國家，他可以採取他認為是必要的殘暴手段，例如在對日戰爭期間製造黃河決堤，同意邱吉爾、羅斯福空襲德國與日本，以及在日本投下原子彈，默許在臺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兩蔣都是有道德良知的人，但蔣介石個性特別一本正經、天真、講求道德，毛澤東指他如魯迅筆下的阿Q，自以為是。蔣介石總是想表現得像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蔣經國則較為務實、自然而真誠。

總而言之，相關研究均顯示，兩蔣是現代史上偉大的人物，儘管有人反對他們、視他們為敵人，但都不可否認他們的人生與事業均極為傑出，對世界史的發展都有相當的影響力。蔣介石尤其左右了世界局勢，50年間包括中國內戰、對日戰爭、二次大戰、國共戰爭、冷戰、韓戰、金門砲戰、越戰、核子危機等等，都站在決策的最前線。蔣經國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相對而言較不重要，但對臺灣的經濟與民主發展，貢獻卓越，而且如他本人所堅信的，這些成果有朝一日將影響中國大陸，蔣經國對世界的貢獻也將更加不同凡響。謝謝。

錢復：剛才聽到陶涵先生精闢的分析，讓我好像年輕了40歲，因為40年



陶涵（左）參觀國史館承辦「永續經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特展」國父紀念館展場。（國史館提供，張芳聞攝）

前我們常像這樣，在臺北對談。我也很榮幸，在我年輕時，曾為先總統蔣公服務了10年。陶涵先生對兩位蔣總統的比較，絕大多數我都同意，黃小姐的翻譯也很好，不過允許我斗膽指出有個字很重要，陶涵先生一開始時說蔣公是位“authoritarian” ruler（統治者），應該譯為「威權」，黃小姐翻成「獨裁」，而且翻了兩次，這是不對的，因為出入很大。

我曾十分貼近地觀察兩位蔣總統，我直覺感到，先總統蔣公是位思想家，雖然是國家領袖，但是他每年最少四、五次，長時間離開工作，到外地去，不

看公文，也不見客，完全在思考問題。每次思考完畢，回到臺北後，馬上就會提出很新的做法或想法。相對的，經國先生是一位非常腳踏實地的實行家。我講這話其實心裡很難過，經國先生晚年健康不好，我多次苦勸，可不可以效法蔣公，休息一下假，但是他不肯，最後累到倒下。他是個實行家！另外還有個不同之處，先總統蔣公是位傳統的讀書人，對於傳統事物，不論天文、地理、命相，都非常相信。相形之下，經國先生是個相當西化的人。今天方智怡女士在現場，孝勇先生大概告訴過妳，經國先生去世前一個月把我從美國召回，告

訴我身上從頭到腳趾沒有一處不疼。不曉得是第幾次了，我告訴經國先生您試試中藥、中醫吧，對於解決痛是有幫助的，我不知道說過多少次，他都笑笑說：「你這個留美的學生怎麼相信這種東西？」只有最後一次，他說：「你出去告訴孝勇，請他幫我找個好的醫生。」他不相信這些。這是我所看出來兩位蔣先生最大的不同。

今天的主題是談經國先生，因為時間有限，我要指出經國先生做為一位實行家，令我最感動的就是經國先生隨時隨地把民眾的福祉視為他首要的思考，絕對沒有別的。根本不考慮個人，心中就只有民眾的福祉。所以我算了一下，從1972年到1988年，經國先生主政十五年半。在座有前經建會副主任委員李高朝先生，各位有興趣會後可以找他詳細地談統計數字。臺灣從1953年開始到今年，我們可以劃分成4期，1953年到1971年、1972年到1988年、1989年到2000年、最後是過去這倒楣的8年。各位算一算，從經濟數據來看，最好的成長率、進出口量以及老百姓的個人平均所得，在第二個階段（1972年到1988年），是臺灣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是由經國先生所促成的。經國先生最重視的就是老百姓，不能讓他們受苦受罪。

他最重視物價，很不巧，他當行政院長的第二年（1973年），發生全球石油危機，物價狂漲，那一年我們的經濟成長率也很不幸地降到1.2%。當時我是政府發言人，經國先生告訴我，物價在過年以前不許漲，一定要讓民眾好好過完春節，然後再調整油價、電價。他特別交代，對於油、電價格，基層的使用不許漲，公用的油（如公共汽車）不許漲，電100度或是150度內不許漲，但是用得愈多的，漲得愈多，也就是你可以負擔就多漲。對他這種愛民如子的心，我的感受最深。大家都說「十大建設」，他卻發脾氣：「什麼是大？」我們就是要打好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所以十項建設裡面，有六項是跟交通有關，其他就是經濟、未來產業升級所需要的配合。

最後我要講一則故事，剛才主持人一開始就提到，經過許多次調查，民眾對於所有歷任總統中，滿意度最高的就是經國先生。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是老百姓當中的一位，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永遠走在民眾中間。在座的周仲南前侍衛長，不曉得擔過多少心。記得有一次我陪經國先生從臺中坐車到日月潭，途中經過一座陳將軍廟，看到一大堆人圍在那裡，經國先生說我們下去看看，把

車上武官嚇壞了，也沒有事先通知，就這樣走進人群。老百姓高興地不得了，他們真正愛經國先生，經國先生也真正享受、很滿足地跟民眾在一起。這是我二十幾年來，念念不忘的一樁事。

朱雲漢：謝謝錢先生。接下來我想請教兩位幾個問題。一開始陶涵先生比較了經國先生和他的父親，在各方面的相似與不同。我想請教的是，如果我們比較經國先生和他同時代的亞洲一些著名政治人物、政治領袖，例如鄧小平、李光耀、朴正熙等，他們之間哪些地方比較相似，哪些地方經國先生又有其獨到、出色之處？

陶涵：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想鄧小平會是一個很好的比較，他們二人其實都是接班人。鄧小平、蔣經國在莫斯科結識，此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聯繫。順便一提（雖然與提問無關），蔣介石與周恩來也一直互有連絡，尤其是在危機時刻，包括他們個人以及國家的危機時刻。對我而言，有充分證據顯示，當1969年尼克森政府開始與毛澤東接觸之際，周恩來便將美國人有意承認中共之事通知蔣介石。所以儘管尼克森及季辛吉告訴蔣介石和駐美大使【按：沈劍虹】，大陸之行不會影響臺灣，蔣介石早就通過周恩來瞭解那不是真的，

是個騙局。美國人不知道的是，蔣介石對此不動聲色，從未要求美方停止相關行動，因為他瞭解這是無濟於事的，這位美國共和黨籍總統的決定，即便國會有意見也無法左右。所以蔣的處理方式很務實、低調，雖然他心知肚明，仍然反應平和、冷靜，儘管臺灣當局還是表達了抗議。回到鄧小平和蔣經國，這二人的處境極為不同，但個性近似，都比較自然、富同理心、外向。鄧小平所從事的改革格局比蔣經國大得多，毛澤東大概很難接受鄧小平的做法，而蔣經國比較追隨蔣介石的腳步，蔣介石對蔣經國的作為應該會感到欣慰。

蔣經國與李光耀關係良好，彼此瞭解，他們都作風務實，不過我想李光耀大概會認為蔣經國在民主化方面進展太快，他在新加坡推動的是比較強硬、控管式的民主統治。

錢復：剛才陶涵先生比較過大陸與新加坡的領導者，剩下的是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當時日本的領導者是佐藤榮作、田中角榮，經國先生和佐藤榮作關係相當密切，佐藤過世後，他的公子佐藤信二每次來臺，經國先生都會召見，這兩位領導者是惺惺相惜的。但是田中角榮完全不一樣，田中角榮任內開始和中共建

交，所以就慢慢疏遠了。韓國是朴正熙和全斗煥，兩人之中，朴正熙正是剛才所說的，非常authoritarian、非常stiff（僵硬）的人。全斗煥不能和經國先生相提並論，因為他下台以後身敗名裂。同樣的是菲律賓的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比較起來，印尼的蘇哈托（Mohammed Suharto）有一個長處和經國先生一模一樣，就是經國先生晚年眼睛不好，不能看東西，所以任何事情都要有人向他報告，他不看報告，只聽報告，而且都能記得，一點不錯，這是很了不起的，蘇哈托也一模一樣。但是蘇哈托家庭的貪汙，這點是和經國先生完全不同的。馬來西亞與經國先生同時代的是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我對他是有感情的，因為我們的關係非比尋常。但是馬哈迪和經國先生不一樣，經國先生對於他的部屬考核非常嚴格，在早期可以說用了一個人之後，一而再、再而三的考核，不行馬上就換，晚年因為健康的關係，對考核沒有辦法那麼嚴格。我認為馬哈迪做為一個領導者不是那麼成功，因為每一個由他提拔起來的人，最後都跟他鬧翻，沒有一個再受重用，而經國先生不一樣。最後泰國與經國先生同時代的有兩位領導者，一位是堅薩（Kriangsak

Chomanan），一位是普瑞姆（Prem Tinsulanond）。這兩人當時都是軍人，和經國先生不同。經國先生雖然做過國防部長，但不是軍人，而是文人部長；泰國這兩位，一位做過總參謀長，一位做過國防部長。有一點和經國先生相像，就是這兩位泰國總理都是很清廉的，大家知道泰國並不以廉潔著稱。而且，經國先生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泰國是在1975年跟我們斷交，斷交後這兩位總理對我們都非常好。

陶涵：剛才提到臺灣政局，我想到蔣介石處理金門砲戰的情形。當年蔣政府對金門砲戰大做宣傳，其實蔣介石在他的日記裡曾寫道，此生怕是無法看到大陸光復了。他表明相關宣傳僅限於臺灣，用以宣示國民黨政府只是暫居此地，並期盼重返大陸。美國政府卻嚴肅看待此事，以為蔣製造事端與糾紛，蔣因此深感挫折，他在談話中暗示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不需擔憂，因為他對此並沒有強烈的意圖。

朱雲漢：錢院長之前幫黃小姐修飾翻譯，我剛才聽到有幾個地方陶涵先生提到mainland，黃小姐都翻成「中國」，這也不正確。如果我們回到兩位蔣先生的思維來看的話，他們會說臺灣與大陸，而不講臺灣與中國，這是我們

當前的一種表述方式。接下來我想把歷史的視角拉回到經國先生的早年，他15歲去蘇聯，在那邊待了相當長的時間，青少年和青年時期都在異鄉，經過了許多風霜、折磨。我想這段成長經歷，對他一生的性格、思維、做事方法等，可能都有深遠的影響。我想請教兩位：如果我們觀察經國先生的人生和事業，他早年的這段經歷，在哪些地方可以顯露出對他產生長期而深遠的影響？

陶涵：我想蔣經國在蘇聯的12年必然深刻地影響了他，而且年輕時到蘇聯去的這個決定，正反映了他早年的理想主義。年輕時他是個革命分子，參與在上海的反英帝抗議活動，接受左派思想，到了北京後決定前往蘇聯。我想這都反映了他的理想主義、逐漸成熟的平等思想，以及富同理心的性格。他到莫斯科以後，信服托洛斯基思想，也就是個真正的左翼分子，之後並成為共產黨候補黨員。我想他在返回中國前夕，已即將成為正式黨員。他與史達林的強硬路線不同，我想當時他並未能深刻瞭解時局，應該是不會接受極權主義的。蘇聯經歷與共產主義帶給他平等思想，也顯示了他的理想性格。

蔣經國到蘇聯時僅15歲。當年在1915年的上海【按：應為1925年】，一

個滿懷理想主義的革命青年自然很容易受到共產主義的感召。

錢復：經國先生在世的時候，在蘇聯的12年好像是一個禁忌，我們與他談話中間，很少觸及。但是有一個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1973年的一天早上（他每天一早上班，第一個就把我從新聞局叫過去），他說：「君復啊，我告訴你，某某人我以後不跟他來往了。」這位先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跟他一起到蘇聯留學，而且與他共事了很久，和他的家庭、在座的幾位，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說：「院長，這樣不好吧！他是您的好友，怎麼可以說不來往就不來往呢？」經國先生說：「他現在做生意，有幾個錢了，我不同他來往！」我聽了很害怕，也很勇敢地向經國先生反應，我說：「報告院長，我們現在要談經濟發展，人家有錢，我們不要生氣，也不要妒忌、排斥，我們希望大家都有錢。」他說：「不可以，我不來。」這就清楚顯示，大概那12年經歷給他的影響是很深刻的。基本上我很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這是罕見的一次。

接下來講我比較熟悉的，大概經國先生當院長、當總統這段時間，一直到我去美國，我們跟美國之間遭遇了許多不幸的事情。包括季辛吉1971年7月到

大陸，尼克森1972年2月到大陸，1975年美國與大陸互設聯絡辦事處，1978年底中美斷交，斷交以後的種種不愉快，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報」，這中間不曉得有多少讓他煩惱與不高興的事情。那時他有英文秘書，早先是溫哈熊先生，後來是葉昌桐先生，再來是宋楚瑜先生。但是遇到這類事情，他都把我叫去，談話都不怎麼高興，談完以後他留我下來，給一句話：「我們今天冬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有時說另一句：「我們打落牙齒要和血吞。」我沒有冬天飲冰水這種經驗，他一定是在蘇聯12年受苦受難，會有這樣的經驗，這激發了他奮鬥向上、不屈不撓的精神。所以每一次幫他翻譯完了，聽他講這些話，對於我一個後生小子來講，真正是受教非常之深，因為我們生活沒有這些經驗，不可能體會到這種苦難。他教導我，我一定緊緊受教。

朱雲漢：其實剛才陶涵先生也特別提到，經國先生到蘇聯的時候才15歲，那個時代中國面臨帝國主義的壓迫，對一個比較有理想的年輕人而言，受左翼思想的影響其實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這是很重要的理解。我再順著這個脈絡來請教兩位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理解經國先生的政治哲學與世界觀？很顯然地

他融合了中西思想，但是他在何種程度上秉持傳統中國思想？又在何種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與價值觀？

陶涵：這又是個很好的問題。剛才我說他在1915年到蘇聯，應該是1923年【按：應為1925年】。當年蘇聯政府宣布放棄以前俄國政府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等等之特權及特許，年輕一輩的中國人對蘇聯都很有好感。我想蔣經國的思想曾受到以下各方面的影響：包括蘇維埃社會主義、家教、早年的理想，他也潛意識地融會了傳統儒家思想、中國式的道德觀與理想。我認為他是個真正的現代中國人，他父親是現代儒家（modern Confucianist），而他是現代化的推動者（modernizer）。雖然他是個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但並不以現代儒家自居，而自認是現代人、改革者。因此我想蔣經國並非傳統主義者，他父親則可說是個傳統主義者。

錢復：我的看法略略有些不同。我想經國先生對於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他奉為極重要的政治理念。他也遵行古人所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以非常重視基層的聲音。這些是傳統的一面。因此他對於任何能夠為民眾服務的事情，他一定全力以赴去做。他覺得他是為民



對談會會場。左起：Ilan MacLellan（蔣友梅夫婿）、蔣友梅、陶涵。（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提供，洪小偉攝）

眾而生，為民眾而做很多的事情。

談到經國先生的國際觀，讓我想起我還很年輕的時候，美國朋友都很擔心他在蘇聯的這段經驗，所以他當總政戰部主任的時候，就被請去美國訪問，當國防部副部長時也去，國防部部長時再去，行政院副院長時又去，美國人每一次都想辦法影響經國先生。我想美國邀請的這幾次訪問都不是友好的，而是刻意想對這位未來的領導者，灌輸美國的自由民主觀念及資本主義思想。剛才提到經國先生是位實踐者、務實者，他在主政以後也瞭解，中華民國的存在、壯大，沒有美國的幫助是辦不到的，所以對於美國的關係非常重視。我記得他派我到美國去當代表時講了好多話，這些話我當然不好意思在這裡說，不過對我的鼓勵很大。我也不諱言，我駐美國五年多，郝柏村先生大概去過4次，也可以

看得出來日子是蠻難過的，然而就是因為經國先生給我那些鼓勵的話，不管再難的事情，我也不會退縮。經國先生是位務實者，他覺得美國對中華民國很重要，便全力拓展對美國的關係。

朱雲漢：謝謝兩位非常精闢的發言。我們現在還有些時間，歡迎在座各位提出一些個人的感想，或者進一步向兩位請教。發言來賓請先自我介紹，因為時間關係，也請各位配合簡短發言，以3分鐘為限，這樣才有機會讓陶涵先生和錢院長回應。

來賓（都先生）：我的問題是假使經國先生還在世，他對於「一個中國」政策的看法如何？是繼續深化？還是逐漸消失？第二個問題想請教陶涵先生，他本人對於「一個中國」政策的看法如何？謝謝。

馮滬祥：主持人、錢復先生、Mr. Jay Taylor，簡單請教幾個問題：我看過Taylor先生的整本著作，非常欽佩，我覺得是英文論著中寫得最好的一本，特別要表達我的敬意。剛才錢復先生的比較，我也覺得非常中肯，只不過我有些問題和觀察。老總統雖然基本上是思想家，可是他是強調知行合一的思想家，特別是王陽明，所以如果不瞭解王陽明，可能就無法瞭解老總統。Mr. Taylor新的著作，我還沒有時間看，不曉得其中有沒有說明。經國先生雖然基本上是實踐家，可是他的實踐是崇法務實，也是剛才錢復先生所講的。經國先生曾經親口告訴我，他最喜歡的思想家是管子，管子是儒家的法家（Confucian Legalist）。所以經國先生很尊重憲法，很強調分工、紀律，比儒家要嚴格得多，當然他也很重人情、溫情，但可能不只是儒家。老總統也不完全是個fundamentalist（基本教義派者）、traditionalist（傳統主義者），因為現在大陸很多學者看了他的所有日記，發現他在1928年北伐時，已經找羅家倫等很多教授，就西方最新的政治、經濟、財政等方面為他上課，非常現代化，一生也追求現代化，所以我想並不是單純的傳統主義可以概括。

影響經國先生的思想家很多，有一點遺憾的是，Mr. Taylor的著作裡都沒有提到這些人。例如經國先生很有民主素養，我覺得他的民主素養來自於唐太宗的《貞觀政要》，即使是帝王時代，唐太宗鼓勵大家批評，提出反對意見，尊重不同的意見，這是民主素養。所以經國先生辦公桌上放了一個「忍」字的大理石。我覺得如果能更深入瞭解這一點，可能會更完整。另外他非常重視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反覆註記和劃線《富蘭克林自傳》，對於他的民主改革，有重要的影響。他當然也很重視曾國藩，《曾國藩全集》也是他的重要參考。剛才錢復先生提到「打落牙、和血吞」，這就是曾國藩的哲學，在苦難中磨鍊人生，強調在逆境中戰勝逆境，這是實踐、也是哲學。老總統是思想家，但是注重實踐，所以設立「革命實踐研究院」；經國先生是實踐家，但是也有他的哲學。最重要的是，他們兩位共同的思想導師就是孫中山先生，Mr. Taylor在著作裡並未提及，是不是因為背景強調的是外交、政治和經濟。大陸現在很重視這點，日後值得繼續處理。

來賓（臺大學生）：我想接續剛才都先生的問題，先請教錢院長：綜觀

這21年來兩岸的和平互動，可謂是經國先生奠定了開創性的起步。雖然在他晚年的政府仍維持三不的原則，兩岸政府間並未接觸，可是他仍毅然開啟了民間的往來與交流。很多大陸學者與相關人士都感嘆，如果經國先生能多活三、五年，可能兩岸事務會好辦許多。從您長期近身觀察，就臺灣當年對大陸相對的經濟實力與國際處境來看，經國先生晚年如何規劃對於臺灣與大陸的未來互動？經國先生認識鄧小平，對鄧小平的性格也略知一二，在中國大陸的改革演變中，他會如何設計或定位臺灣的角色？第二個問題想請問Taylor先生：做為一個外國學者要瞭解兩位蔣總統，勢必要對他們作投射性的、設身處地的瞭解，所謂reflective understanding。我想瞭解在您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揣摩兩位蔣總統的人格和心境時，有什麼特別困難或具挑戰性之處？謝謝。

錢復：都先生的問題是假如經國先生還在，對於「一個中國」政策會有什麼看法。我想這個問題不需要答覆，因為經國先生畢生堅持一個中國，絕對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馮教授所提示的幾點，都是非常正確的。我很抱歉，因為要做contrast（對比），所以會有這樣的比較方式。

最後關於那位同學問的問題，提出了經國先生為兩岸關係奠下了良好基礎，有人說他如果多活三、五年，兩岸關係會不同於今日。我同意大陸這些學者的看法，就是兩岸之間無法切割，硬要切割，最後會害了自己，我簡單說明如上。

陶涵：我贊成Fredric所說，蔣經國堅持「一個中國」的理想。我之前曾提到，蔣經國相信「一個中國」政策的實現，有賴臺灣人民的支持，以及兩岸必須民主化。我今天一開始提到了天安門事件，倘若蔣經國今天還在世，我相信他會感到欣慰，因為臺灣社會的民主化使他的理想有朝一日可能成真，中國大陸的條件則尚未成熟，可能需要等到下一個世代才能實現民主化，而臺灣人民在此之前應保持自主性，以維持臺灣海峽和平。至於我個人，我同意蔣經國在這方面的看法。

另外我想補充說明，蔣經國可能認為短期內，兩岸不可能達成實質上的統一，對於雙方目前難解的歧異，也許儒家的中庸之道，能有助於找到兼顧雙方原則與利益的解決方法。

來賓（梁先生）：1980年代蔣經國擔任總統的時代，我在錢院長當時所

成立的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專門委員會擔任專門委員，同時也被推派為教育部大專產業升級的法制委員。當時我們充滿了願景，很自然地我成了經國先生的信徒，到現在仍然一直貫徹他的工作。我已經從很出名的生意人，走到鄉村，這是因為自從中美斷交以後，我就跟隨經國先生「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去了。我因為來自民間，所以擔心一個問題，那就是臺灣失去了很多機會。當年我為了經國先生講的一句話，蔣家不會有第三個人當總統，因此我和朱高正結合參政，後來我和朱高正分道揚鑣，因為李登輝總統重用郝柏村院長，朱高正反對，而我贊成。經國先生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堅守純粹的中華道統，擁有信念，他的信念來自於〈禮運大同篇〉，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到「世界大同」這樣的理念。其次，他對每件事情能深入剖析，來自於「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剛才提到知行合一學說，也就是「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明明德」的「明德」是學問，也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則是「篤行之」。關於這個道理，我曾經請教前臺大校長陳維昭先生：「學問和學識何者重要？」今天在

座有很多大官，很多有學問而沒有學識。陳維昭校長回答學問比較重要，我說：「錯了！」他問我為什麼錯，我將剛才所說的解釋給他聽，因為知行合一，所以學識比較重要。第三是如何貫徹的問題，也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必須要有信心的。我想經國先生就是有信念、信心，然後產生信用。剛才錢院長提到經國先生因為某人做生意就不跟他來往，就是因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念。我想請教：今天我們對馬英九總統很失望，他是否能傳承經國先生的偉大信念，將其發揚光大？謝謝。

朱雲漢：因為時間的關係，接下來就邀請今天兩位主講貴賓做最後一輪的發言。最後我還想提一個小問題，請兩位談談，經國先生的領導風格，對於當前在位者而言，有何值得學習之處？

陶涵：首先，剛才有位先生問到研究兩位蔣先生的困難之處，事實上問題還不少。其一是史料太多，數以萬計，例如蔣介石的日記等等，大概如喜馬拉雅山般高。而研究本身必須得到許多人的協助，否則不可能完成，這些協助

來自包括莫斯科、北京、上海、臺北、紐約、加州等地。另外就是我原先認為有個無法克服的問題是，我擔心受訪者會因為中國傳統儒家行事作風，而不願意批評這兩位領袖，不願意說些可能產生爭議的負面評語。但後來我發現有許多國民黨官員，特別是與蔣經國同世代的幾位，當他們得知我正在寫他們所景仰、所曾追隨過的人物的傳記時，明白為了其言論的可信度與可能產生的影響，必須知無不言，毫無保留，如此才能彰顯該人物在歷史上值得尊崇之處。

回到歷史，如同我之前所說的，蔣經國是個現代人，他的現代化理念，可說超越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蔣經國行事務實，但秉持原則，例如在「一個中國」政策上，他本人堅守此一原則，但並未強迫臺灣人民接受，態度務實而有耐性，我認為他父親也會同意他如此做。

錢復：我想就剛才主持人最後的問題簡單答覆。經國先生的領導風格就是以德服人，把自己做為典範，讓部下跟著走。好比說他儉樸，就沒有人敢奢侈、浪費。他愛民如子，部下也是如此。大家可能不曉得一樁事情，那就是經國先生對官位看得很淡，在座最年長的張祖詒先生，前後當了15年的副秘書

長，從行政院到總統府，沒有換過，可是張先生對經國先生的影響非常大。在座的郝柏村先生當了8年的參謀總長，表示經國先生對他的信任，應該提升，也沒有提升。可是對於放在高位的人，經國先生未必像對張先生、郝先生般的重視。例如經國先生晚年，七海官邸修了一條路直通臥室，郝先生的車子可通行，很多比郝先生位階還高的人卻無法走，這事我也許不該在這裡說。他信任一個人，把他放在一個位子上，一放就放很久，心裡對他有些歉意，可是用慣了，還是把他放在那個位子上。這是經國先生和很多領導者不一樣的地方。

朱雲漢：各位來賓，很高興在過去兩個小時，可以一同來分享陶涵先生與錢院長深刻的觀察和心得，非常感謝他們，也感謝各位來賓撥冗參加這場對談會。我也要特別感謝合辦單位國史館的林滿紅館長、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莫昭平總經理，在過程中給予許多協助。基金會在外面準備了茶點、飲料，非常歡迎各位來賓再多逗留一點時間，也可以跟陶涵先生有一些互動，如果您剛好想購買這本剛才新刷的《蔣經國傳》，也可以請他簽名。我們今天的活動到此告一段落，感謝各位的參與！